

当前农村文化贫困的成因与对策研究

罗序斌¹ 孙 露²

(1. 江西师范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2.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5)

摘要: 文化贫困有绝对和相对概念之分,具有度量指标的阶段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特点。在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当前农村文化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文化生活贫乏、文化设施使用率低、集体性文化活动少、价值观偏离主旋律等。造成文化贫困的原因主要是农民低收入水平导致文化消费先天不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与人才供给后天失调、人口结构失衡引发农村文化活动主体“空心化”、网络文化平台兴起对农村文化生态的冲击。农村文化贫困问题应从农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需要从六个方面着力推进富裕乡村、文明乡村、智慧乡村的建设。

关键词: 农村文化; 文化贫困; 文化扶贫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6)04-0059-06

一、引言

文化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对此问题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长期探索。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人类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斯密(Smith,1776)^[1]就指出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马尔萨斯(Malthus,1798)^[2]认同斯密的观点,但他认为劳动的边际报酬具有递减性,并悲观预言经济增长会因劳动力的增长约束而陷入停滞。基于此,李嘉图(Ricardo,1817)^[3]提出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基本原因。后来众多学者根据这一价值判断建立了各种基于资本积累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论证了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和增长的基本条件。然而,资本和劳动两个传统的生产要素无法解释国民收入的增长余值问题。为此,索洛(Solow,1956)^[4]、卢卡斯(Lucas,1988)^[5]、罗默(Romer,1990)^[6]和熊彼特(Schumpeter,1934)^[7]等深入研究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科技创新就是“增长余值”,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增长的根本原因;欠发达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舒尔茨(Schultz,1964)^[8]也认为先进的农业技术要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他进一步提出要获得和更好使用这些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必须以农民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为前提,因此,人力资本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诺思(North,1973)^[9]则从制度创新和变革的视角对经济长期增长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所认为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本身就是增长,而非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有效的制度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有效的制度是怎么来的?我们认为,文化是隐藏在制度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地区制度确立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而且还会影响到当地民众的信仰以及经济行为^[10]。文化上的落后,往往会造成技术落后、制度落后,进而导致经济落后。一个地区物质的贫困、经济的欠发达,与其文化的落后有很强的关联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文化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加大,社会文明程度日新月异,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还没有得到根本

收稿日期: 2016-05-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带动机制研究”(12JL04); 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江西小微文化产业发展潜力研究”(15ZT28)

作者简介: 罗序斌(1981-),男,江西九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贫困经济学;

孙 露(1986-),女,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农村职业教育。

性的扭转,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还非常显著,“城乡文化距离”并没有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善,没有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而改善,反而具有不断分化的特点。时下,我国很多农村地区文化变型或衰退,“文化贫困”问题突出,且还有不断扩大和恶化的趋势。这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更不利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如果不解决当前农村文化衰落、文化贫困问题,即便农民“吃饱了肚子”,也会因为精神上的贫困而继续贫困落后^[11]。基于此,本文以农村文化贫困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界定概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的方法,找寻当前农村文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剖析农村文化贫困的成因,并针对性提出文化扶贫的若干对策建议。

二、文化贫困的概念与主要特点

贫困和反贫困一直是社会发展研究的主题。对于“什么是贫困”,一直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家庭处于“基本贫困”,是指其总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有的学者认为贫困应指贫困感,是一种相对的贫困状态;有的学者认为贫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价值判断,消灭贫困是一种道德上的善举;还有的学者认为贫困是一种政策性定义,是根据社会实际制定的生活标准^[12]。虽然,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贫困的概念,但均是指经济贫困、物质贫困,而未专门进行有关文化贫困问题的探讨。

我们认为,文化贫困是相对于经济贫困、物质贫困而言的一种“精神层面的贫困”。文化贫困有绝对和相对的概念之分:所谓“文化绝对贫困”是指当地人群与社会其它群体相比,文化生活处于绝对低下的水平,通常情况下他们占有的文化产品数量严重短缺,不能正常维持最基本的文化生活;所谓“文化相对贫困”是指当地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相对不足,文化产品质量相对较差,文化生活方式相对落后。

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文化贫困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纵向度量指标具有阶段性。同一个地区,不同时期判断衡量农村文化贫困的标准是不同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前行。比如,在过去某一阶段,衡量文化贫困主要是扫除文盲率、成人识字率以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情况等指标;而当前全国各地已基本完成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农村公共文化投入有了很大改善,衡量文化贫困的指标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主要应体现在农民读书看报率、农村文化设施利用率、日常文化生活方式是否符合主流价值观等方面。二是横向文化贫困表现形式呈现多样性。同一时期,文化贫困的表现形式会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教育贫困、知识贫困^[13],体现在当前农村居民主动获取、吸收和运用知识的内生能力缺失;有的地区主要表现为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而造成的文化生活的单调和落后;有的地区农民信仰偏离、价值观扭曲、文化审美观低俗较为显著;更多一些地区表现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协调,在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精神空虚问题越来越严重。当然,上述表现形式也有互相交织的情况。

三、农村文化调查反映出的文化贫困问题

当前,农村是否存在文化贫困问题?文化贫困有哪些表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入农村,走近农民,进行实地调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调研的便利性,我们选取H省G村作为调查样本,力图小中见大,剖析成因,提出对策建议。

G村距离县城16公里,属丘陵地区,可说是我国大多数农村文化贫困的一个缩影。该行政村共有22个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以徐、李姓为主,共计1005户,4108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1201人,0-14岁的儿童1521人;男性人口2102人,女性人口2006人;常年在外打工者2302人;文盲人数1001人(主要为60岁以上老年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021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67人,其余为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该村与我国大部分农村一样,以粮食种植为主,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依靠粮食销售及外出务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全村农民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是农民日常文化生活与农民日益改善的物质生活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反差。

为了深入了解该村文化贫困的状况,获取该村真实的文化建设或文化生活数据,我们的调查主要采用以下方式进行:一是深入各个自然村,与村干部和随机选择的村民进行访谈;二是走访当地乡镇文化站,与当地分管文化工作的人员进行交流,获取该村文化建设基本数据;三是发放调查问卷,每个自然村选取12户,其中高收入2户、中等收入8户、低收入家庭2户,共发放问卷264份,收回有效问卷217份,回收率82.19%。问卷筛选和处理主要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凡存在选项漏答或填写不完整的、答案明显存在规律性痕迹或不符

合主观常识判断的,原则上不采用。根据调查,可以看出该村文化贫困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农民文化生活贫乏。一是文化生活方式单调。农民劳作之余的主要消遣活动是走亲访友、闲聊打牌。现场调查当日因天气原因,村民从事各类劳动人数较少,但打牌、打麻将人数占成年村民比例超过40%,中老年人扎堆闲聊的接近20%,少数年轻人上网、看电视、读书看报的不到3%;现场调查当晚,各自然村农民半数以上在家看电视、闲聊,仍有大约超过15%的人打牌打麻将,跳“广场舞”的289人约占全村人口7%。二是知识发展型文化消费水平很低。调查中发现,该村农户除了子女教育和少量娱乐性费用支出外,仅有少数被调查家庭会购置一些书报杂志,全年支出最多者约为200元;对县、乡文娱商演活动,一年中偶尔会看一二次,每人每次平均支出约30元;至于其他能够用于增长知识、促进个人发展、提升精神文化面貌的文化消费支出大体为零。可以说,大多数村民基本没有“文化消费”的概念。

2. 文化设施使用率低。H省目前60%的行政村建有公共文化活动室(活动中心),80%的行政村建有“农家书屋”,20%的行政村建有文化活动现场,20%的行政村配置了公共体育设施。G行政村的22个自然村共建有8个文化活动中心,设有电教室、宣传走廊、画廊、乒乓球桌、标准舞台等;1个“农家书屋”藏有涵盖种植养殖、养生保健、生活服务、少儿百科、自然科学和文学等各类图书2000余册,应当说该村具有一定的文化活动硬件设施条件。但据多数村民反映,这些硬件设施刚建成时,许多村民在闲暇之余会去活动中心转转,打乒乓球、下下棋,或去“农家书屋”借阅书报杂志,但随着新鲜劲过去,村民就很少光顾了。我们在该村调查时注意到,现有的“农家书屋”积满了灰尘,图书摆放散乱,且长久没有更新;文化活动中心主要成了村民打牌、打麻将、闲聊的聚会场所,经常被村民借用摆酒席,办红白喜事,令人感到非常惋惜。

3. 集体性文化活动少。根据调查得知,除去H省特定时期组织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外,村民自发组织的舞龙、闹花灯等传统民间文化活动一年不如一年热闹,曾经在该村比较活跃的农民自拉自唱活动基本消失。我们在该村设计了一个针对14岁以上成年人的“满意度调查”,对于“你对不同时期农村文化活动的活动的评价”问题,有53%的人认为70年代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最多,14.1%的人认为是80年代,9%的人认为是90年代,23.9%的人认为2000年以来群体性文化活动最多最好;对于调查提出的“你是否需要和喜欢农村文化活动”问题,有41.8%的人表示“很喜欢”,45.2%的人表示“比较喜欢”,12.1%的人觉得“无所谓”,只有0.9%的人明确表示“不太喜欢”,没有人表示“很不喜欢”;对于“是否希望由政府牵头举办群众性文化活动”问题,绝大多数人(89.1%)表示“希望”,9.6%的人表示“无所谓”,只有1.3%的人“不希望”举办。由此可见,大多数村民依然向往公共文化生活,农村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

4. 价值观偏离主旋律。价值观是沉淀在农村文化中的深层内核,极大地影响和决定着村民的思维习惯、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新的价值理念虽然对乡村传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是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乡村社会传统的诚实守信、以和为贵、俭朴谦虚等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邻里之间曾经盛行的互惠性换工、互助性帮工正逐渐消失;二是金钱至上观念盛行。谁有钱谁的话语权就大,金钱与利益交换成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砝码”,一些村民存在损公利己、聚众闹事等不良行为,有村民反映几个家庭比较富裕的人甚至骗领低保;三是炫富攀比之风盛行。调查发现,该村结婚所需费用5-7万的占72.3%,8-15万的占26.5%;全村98.7%的家庭收(送)过彩礼,彩礼钱3-5万占69.1%;6-10万占24.3%。村民比较喜欢攀比建房子,80%的家庭都已建新楼房,经过我们实地观察,大多是2层以上楼房,有的新房建得还比较阔气漂亮,但据调查,也有一些村民为了娶媳妇和建房子,负债累累。对此,81.2%的人认为村里存在较为严重的婚嫁和建房攀比现象,76.5%的村民认为之所以攀比是因为面子问题。

四、农村文化贫困的原因分析

上述农村文化贫困问题,反映着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体现了农村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 农民低收入水平导致文化消费先天不足

国际研究表明^[14]: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美元以内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3000美元之间时,人们消费需求进入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文化消费占比逐

步提高的阶段;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000 美元之后,人们的消费支出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文化类消费需求逐步超过物质类消费需求。近年来,农民收入在不断增长,但农村生产和生活成本也在上升。比如,除了用于秧苗、化肥、农药、耕牛及农机具等“生产性支出”,建房、交通通讯、家用电器设备及柴米油盐等“生活性支出”,生老病死、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等“个人保险性支出”外,根据统计,H 省 2014 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 356.42 元,仅占 H 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117 元的 3.28%。在此项目的消费支出中教育仍然是大头,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免除了学费、课本费,但许多农户仍要负担孩子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的费用。因此,农户用于订阅报刊、购买图书和文化用品、看戏看电影、外出旅游及体育活动等家庭文化消费支出也就微乎其微了。

(二)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与人才供给后天失调

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内在需要,也是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持久动力。H 村的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电教室等都由政府出资建设,建成后交行政村管理,管理人员补贴、水电费支出、图书资料更新、场馆设备维护等费用,多由村里自行解决。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上级财政通过县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每年也会向乡里下拨一些农村文化专项建设资金,如果能“跑下项目”,每年大概有 3—5 万元,但这些专项经费常被县、乡挪用于其它应急事项,真正用在村里文化建设的资金不容易到位。由于村里集体经济薄弱,其它方面收入很不稳定,村级公用经费仅能维持基层组织自身运转,难以保障文化发展创新所需资金。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G 村目前有 2 名年过六旬的老人兼管 8 个文化活动中心、1 个“农家书屋”及其它文化设施,因不够专业也不够专心,常常无所作为。另据了解,该县相当一部分乡镇文化站干部年过半百,普遍存在业务水平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等情况,农村文化工作专业人才“断层”问题突出。

(三) 人口结构失衡引发农村文化活动主体“空心化”

中青年农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大量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劳动力出外务工。经调查,该村在外打工的人员中年龄 18 岁以下占比 0.8%,18—35 岁占比 51.69%,36—45 岁占比 29.46%,45 岁以上占比 18.05%,而留守在农村的主要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及 14 岁以下的儿童。本应为农村文化的重要建设者的中青年大多外出打工,在家留守的主要是老人与儿童,致使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严重缺位。导致乡村文化活动“空心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乡村文化精英的流失。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不少人通过升学、参军、提干、进城打工等渠道纷纷离土离乡,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较多社会资源和较强办事能力的乡村精英流失严重,使乡村文化建设中坚力量匮乏。

(四) 网络文化平台兴起对农村文化生态造成强烈冲击

近年来互联网走进农村千家万户,特别是移动通信终端在农村快速普及,对农村文化生态带来极大影响。调查显示,G 村农户接入网络端口比例已达 40%,全村有手机 2805 部,约占人口总数的 68.28%;开设个人微博的有 8%,使用 QQ 的人数达 15%,使用微信的人数达 30%。相对于传统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互联网具有信息量大、更新迅速、查询方便、交互性强等优势,QQ、微博、微信、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等应用平台以及不断推出的各种实用 APP,可以为农民提供更为丰富多彩、更加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而且互动参与性也高。互联网在农村迅猛发展的同时掺进了多元文化观念,不仅对官方媒体形成冲击,也对农村传统文化带来严峻挑战。

五、加强农村文化扶贫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农村存在的种种文化贫困问题,应从农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需要着力推进富裕乡村、文明乡村、智慧乡村的建设。

(一)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物质基础。从长远来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公共财政继续给予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依靠创新驱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物质条件和技术的现代化;在壮大农业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种粮养殖等农业大户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基础上,着力培育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等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工业发展的思维发展农业,在尊重农户意愿基础上,以农民入股、土地托管等方

式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推进各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打通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延伸价值链,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要鼓励和支持农村年轻人创业,利用他们出外务工形成的竞争意识,积累的原始资本、信息资源和社会经验,通过开网店、微店、网上农场等参与农村电商的发展;充分发挥他们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推进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的深度结合,用民俗文化丰富乡村旅游的品质和内涵,形成旅游与文化产业互促、互补、互兴发展的新格局;大力发展“农家乐”和“企业+农户”为主的乡村旅游模式,设计“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特色化、差异化的旅游精品,带动当地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

(二) 树立样板以点带面,建立多元化筹资机制

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树立现代乡村治理理念。建议组织力量对本地农村文化现状进行全面摸底调查,深入了解当前农村文化与农民思想状态;遴选一批在文化建设上有示范效应的县、乡、村,实行文化建设精准扶贫政策,树立样板以点带面,着力改变农村文化洼地局面;调整农村文化财政投入增量长期低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其它农村公共服务的状况,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比例,逐步提高村级文化建设转移支付补贴力度;严格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落实村民对文化专项资金使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积极鼓励和大力引导社会资金、民间资金进入农村文化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农村文化建设筹资渠道;研究和出台具有针对性的乡村文化建设政策,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立法步伐。

(三) 从制度入手,加强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实现农村文化建设健康发展、形成文化自觉关键要靠人,要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带、有人做。要从制度上着手打造精干高效的农村文化干部队伍,鼓励德才兼备、有创业激情的干部和大学生到农村去挂职任职,负责抓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建立文化建设“硬指标”与“软指标”并重、以实效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标准,健全完善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工作考评体系;着力改善现有农村文化人才的待遇,切实解决乡镇文化站编制不足、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用待遇留人,用事业留人;加强乡村文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选送农村文化骨干赴高等院校、艺术团体进修,组织专业人才以驻村包点等方式对农村文化骨干人才进行培训;发展农村文化带头人队伍,从村民中选聘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志愿者,做好乡村文化活动室及各类文化设施的日常管理工作。

(四) 城市反哺农村,搭建城乡文化交流新平台

着力缩小“城乡文化距离”,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文化产品购买服务力度,多送好书、好戏、好电影、好节目下乡;扩大文化下乡的社会参与面和市场运作度,鼓励企业出资冠名开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农村文体活动;动员知名作家、画家、摄影家、戏曲家、音乐家、表演家等文艺专业工作者深入农村,体验富有特色的农村文化、风土人情,创作优秀的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高质量文化作品;组织适当形式范围的业余文艺调演汇演活动,扶持和培育一批接地气的农民业余文艺表演团队;积极鼓励民营文艺团体和文化经营户的发展,支持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培育和发展非营利性文化社团组织,对他们提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予以支持和规范。

(五) 应用新技术,实施“互联网+农村文化”工程

高度重视互联网发展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上升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像“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那样,推进“村村通互联网”,让网络走进农村千家万户;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应用,打造“智慧乡村”,实施“互联网+农村文化”工程,针对农村实际情况,设计生产农民能买得起用得上的电脑,将信息资源链接开放的信息软件平台,鼓励开发与农村生产生活关联密切的APP应用软件;建立行政村微信公众服务号,开辟通知下达、舆情上传、调查投票等村务管理等基层工作板块,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市场商品购销信息、特色产品推荐等经济活动板块,教育培训、合作医疗、社会保障及文化活动等社会生活板块,实现互联网环境下的全方位服务;组织开辟村民QQ群、微信群,实现外出务工和留守人员信息与情感的密切沟通,促进“互联网+农村文化”工程真正起到实效。

(六) 抓住农村文化建设之魂,坚持先进文化方向

紧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农村文化建设之“魂”,推进农村文化工作创新,用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阵地,实现农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协调发展、同时进步;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多种渠道,着力提升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诚信建设水平,推进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用健康有益的先

进文化教育农民群众,帮助他们自觉抵制封建迷信、邪教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革除各种陈规陋习,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打击漠视法纪、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危害一方的农村黑恶势力;发挥当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利用他们的德行、威望、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榜样力量教化乡民,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6 - 16.
- [2]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0 - 16.
- [3]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200 - 203.
- [4] Solow, Robert.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86 - 94.
- [5] Lucas, 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22): 22 - 42.
- [6] Romer, Paul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 71 - 102.
- [7]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66 - 77.
- [8] 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50 - 174.
- [9] 道格拉斯·C·诺思.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27 - 236.
- [10] 高波. 文化资本、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浙商与粤商成长经验的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46 - 47.
- [11] 汪远方. 乡土中国的发展亟须精神扶贫 [J]. 新华文摘, 2015(21): 117.
- [12] 阿马蒂亚·森. 贫困与饥荒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6 - 34.
- [13] 熊丽英. 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 [J]. 求索, 2004(2): 133 - 135.
- [14] H·钱纳里, S·鲁滨逊·赛尔奎因.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61 - 67.

Research on the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rrent Rural Culture Poverty

LUO Xubin¹, SUN Lu²

(1.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2. Jiangxi Modern Polytechnic College, Nanchang, Jiangxi 330095, China)

Abstract: The region's under-development is often closely related with its culture poverty.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poverty can be absolute and relativ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measurement indicators periodically and multiple manifestations. Based on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the main performances of rural culture poverty are the poor culture life of peasants, low culture facilities utilization, fewer communality culture activities and cultural values deviating from the main melody. The main causes of cultural poverty are farmers' low income level leads to the deficiency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the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funds and talents supply, the rural cultural activity main body's "hollowing out" caused by population structure imbalance, and the network culture platform has strong impact on rural cultural ecology. Rural cultural poverty problem should be solved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we should take measures from six aspe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ffluence, civi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village.

Key words: the rural culture; culture poverty; culture poverty alleviation

(责任编辑: 张秋虹)